

敦煌的佛教与社会

敦煌讲座书系



郝春文 陈大为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郝春文 陈大为 著

敦煌的佛教与社会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的佛教与社会 / 郝春文、陈大为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 1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405-4

I. ①敦… II. ①郝… III. ①敦煌学—佛教—研究
IV. ①B948②K870.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7453号



出版人：李西平
总编辑：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朱富明 王文琴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赵 鹏

敦煌的佛教与社会

郝春文 陈大为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75 插页 4 字数 332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978-7-5423-2405-4 定价：50.00 元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着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作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前 言

说到敦煌古代文化，绕不过去佛教。这是因为，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是佛教文化遗存；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佛教典籍。从某种意义上说，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献都是佛教与社会交接的产物。敦煌莫高窟在营建过程中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和资助，同时也成为敦煌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民众从事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敦煌佛教典籍有很多是社会捐资抄写的供养品，敦煌社会民众在从事佛教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转读写经，佛经以外的文书和典籍则均为敦煌佛教与社会互动的结晶。所以，探讨古代敦煌佛教与社会，对深入认识和了解古代敦煌文化，意义重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者编纂的《讲座敦煌》丛书，有两种以佛教为题，即《敦煌与中国佛教》和《敦煌佛典与禅》。但这两部著作的重点都是对敦煌佛教典籍的内容及价值进行解说。该丛书之《敦煌的历史》和《敦煌的社会》有若干章节涉及敦煌佛教与社会。如《敦煌的历史》第五章第四节为“归义军与敦煌佛教教团”，第五节为“莫高窟千佛洞与归义军”。《敦煌的社会》第一章第三部分“唐代敦煌社会的外貌”中，涉及佛教寺院和石窟寺。该书还专设寺院与生活一章，讨论了“莫高窟千佛洞与大寺和兰若”及“晚唐五代敦煌寺院经济”。限于体例，以上著作都未能对敦煌佛教与社会做充分的讨论。

最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佛教与社会做了很多有价值的

探索，但这些相关论著都是对其中某一方面进行具体研究，迄今尚未见有专门对此问题做通论性总结的专著。本书作为第一部通论敦煌佛教与社会的专著，自然无法涵盖这一论题的所有方面，只能就学术界研究比较充分的方面做概括性介绍和解说。

本书主要依据敦煌藏经洞出土资料和敦煌石窟资料探讨敦煌佛教与社会，除第一章和第四章时间范围涵盖整个中国古代以外，其他章节的时间范围大致限定在唐五代至宋初，空间范围则限定在古代敦煌管辖的区域。另，本书将僧团和寺院也看作社会单元，故敦煌地区僧团、寺院及僧尼的生活等问题均属于本书的考察对象。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敦煌佛教概观	1
第一节 敦煌佛教的兴起与发展	3
第二节 敦煌佛教的兴盛	11
第三节 敦煌佛教的衰落	35
第二章 敦煌的僧团及其寺院	41
第一节 敦煌寺院的沿革兴衰	43
第二节 敦煌地区僧团及其寺院组织机构	68
第三节 敦煌寺院的财产构成	92
第四节 敦煌寺院的建筑布局	123
第五节 敦煌寺院的寺学	165
第三章 敦煌的僧尼	175
第一节 敦煌僧尼的出家与受戒	177

第二节	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	193
第三节	敦煌僧尼的修习活动	219
第四节	敦煌僧尼的宗教收入	230
第五节	敦煌僧尼的遗产与丧葬	250
第四章	敦煌石窟与社会	263
第一节	敦煌社会与莫高窟的营造	266
第二节	敦煌石窟的社会功能	291
第五章	敦煌寺院的依附人口	309
第一节	吐蕃时期的敦煌寺户制度	311
第二节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	324
第六章	归义军政权与佛教的关系	333
第一节	归义军政权对佛教的扶持和利用	335
第二节	归义军政权对佛教的控制与管理	353
参考文献	373



第一章

敦煌佛教概观

敦煌扼据“丝绸之路”要冲，地接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交流的孔道。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很可能是经由敦煌传入内地的。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陆、海两条，但早期应以陆路为主。如高僧安世高、支娄迦讖、支曜等，都是来自西域。这些经由丝绸之路东来的佛教僧人，在他们进入中国内地的途中，必然要经过敦煌。所以，敦煌应是中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但目前所知明确记载敦煌佛教传播的资料始于曹魏时期。经过晋至北朝时期的发展，隋与唐前期，敦煌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佛教城市。唐中叶以后，敦煌成为西北地区的汉化佛教中心。归义军以后，敦煌的佛教逐渐衰落。本章按时间顺序概要介绍各时代敦煌的佛教概况。

敦煌佛教的兴起与发展

一、敦煌佛教的早期传播与奠基

佛教何时传入敦煌，史无明载。敦煌悬泉汉简一枚记有“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①，此简中的“浮屠”为佛教用语。“浮屠”就是西域语言对梵语“佛”字的汉文音译。这说明从西域传来的佛教，对当时的敦煌地区已经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以尊贵、庄严的“浮屠”（佛）为里名，也表明当时的敦煌人还缺乏对“浮屠”的敬畏。等到后来敦煌有了寺院和大批佛教信徒以后，这类对“浮屠”缺乏敬意的地名也就自然消失了。

据《高僧传》记载，曹魏时期（244年前后），印度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大月氏人竺法护为徒。竺高座是目前所知最早在敦煌传播佛教的僧人。在此之前像竺高座一样在敦煌传播佛教而未能留下姓名和事迹的僧人当不乏其人。

竺法护，梵名昙摩罗刹或作达摩罗察，世居敦煌。他八岁随竺高座

^①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85—194页。

出家，每日诵经上万言。此时的西域地区已有为数不少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佛教寺院。晋武帝时，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通晓西域各国 36 种语言文字，携带大量的“梵本”佛经东归。266 年，他东行到长安，从事译经和传教工作。《高僧传》中说竺法护“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284 年，竺法护回到了故乡敦煌，继续从事传播佛教的工作，在敦煌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汉胡僧俗佛教信徒集团。法护译经时有很多人人为他执笔、详校，其中最著名者如聂承远、道真父子，法护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这不但说明法护道业高深，受人尊重，也说明他是一个善于团结同行、很有亲和力的人，因此被誉为“敦煌菩萨”。此后，法护又曾到长安、洛阳等地从事传教和译经工作。他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为佛教在东土流传作出了重大贡献。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 159 部，309 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 95 部。其后，各家《经录》续有增加，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刊定法护本现存 91 部 208 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有 74 部 177 卷。^①

竺法护译经种类繁多，包括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法华、律部等诸类大乘经律，又有本生经类、西方撰述等，几乎网罗了西域流行的要籍，尤其是他翻译的《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渐备一切智德经》《弥勒成佛经》《普曜经》等对后世影响巨大，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高僧道安谓：“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②僧祐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③

① 竺法护译经卷数，历来说法不一。此据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关于竺法护的内容。

② [梁]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九《渐备经叙》，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332 页。

③ [梁]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法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518 页。

由于竺法护在当时佛教界的影响很大，时人颇多赞誉。东晋时代玄学高僧支道林曾为竺法护作过“像赞”，曰：“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领拔玄致。”^①东晋名士孙绰作《道贤论》，把竺法护与“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并列，说：“二公风法高远，足为流辈矣。”^②竺法护在当时的声望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竺法护的弟子众多，最著名者当首推竺法乘。《高僧传》卷四《竺法乘传》说法乘“神悟超绝，悬鉴过人”，颇得老师赏识。他先随师父到长安，后来又返回老师的故乡敦煌，在这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高僧传》称赞他“立寺延学，忘身为道，海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③。即使在今天看来，法乘在敦煌的传教活动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他建立了寺院，使敦煌的僧俗信徒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这就为敦煌佛教的延续与扩大影响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他的弘法活动不仅扩大了佛教队伍，也加深了佛教对敦煌一般民众的影响，这就为敦煌后来成为佛教圣地奠定了基础。

二、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信仰的确立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张氏、前秦苻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等五个政权。直到北魏灭北凉后占据敦煌，敦煌才又重归北方统一政权之下。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和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的佛教兴盛起来，其信众已不限于社会上层，在普通民众中也开始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些敦煌籍僧人因在内地成为高僧而被收入《高僧传》。如于道邃为长安名僧于法兰的高徒，他“既善方药，又美书札，尤巧谈

①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竺昙摩罗刹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页。

②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竺昙摩罗刹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页。

③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四《义解》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5页。

论，高简雅素，性好山泽”，常与南朝士人交游，在盛行清谈的南方士族文人中享有盛誉。同书卷九《单道开传》记载，单道开也是敦煌人，重苦行习禅，兼有神异功能之类，能治眼病，“观国兴衰”，连当时事石虎的神僧佛图澄也对其极为赏识。《高僧传》卷十一《竺县猷传》说敦煌高僧竺县猷南巡赤城山（在今浙江省），以坐禅为业，“禅学造者，十有余人”，连王羲之这样的名士都“闻而故往，仰峰高揖，致敬而返”。这些敦煌籍僧人的出名事迹虽均在内地，但敦煌僧人在内地的频繁活动也折射出敦煌佛教发展的水平不低。

前凉（314—376）为汉族人张寔所建。张氏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河西，政治中心是河西东部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当时敦煌是前凉政权的西部重镇。据《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①张轨曾任西晋凉州刺史，卒于公元314年，实为前凉创始人。《晋书》卷八十六载，前凉自张天锡继位后，国政日渐衰微，气息奄奄。面对这种情况，张天锡在其境内大兴佛教，寻求精神寄托和佛教的护佑，积极开展译经活动。前凉译经，大多亡佚，现存下来的只有这一时期翻译的《须赖经》。

敦煌本前凉净明所诵《法句经》的发现，是前凉时代敦煌佛教发展的又一证据。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前凉写本《法句经》为卷轴装，末尾有题记二则：

升平十二年（368）沙弥净明。

咸安三年（373）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经》。

卷后的两行题记，可能是沙弥净明先后两次诵经的记录。升平、咸安均

^① [北齐] 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2页。

为东晋年号，远在河西的前凉政权一直沿用着东晋年号。^①《法句经》出于敦煌石室，足以说明前凉时期是敦煌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北凉攻占敦煌之前，敦煌当地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带有道教色彩的民间鬼神信仰。^②尽管有佛教僧人在敦煌活动的记载，但他们对本地人宗教信仰习俗的影响还是有限的。直到北凉攻占敦煌的公元421年，佛教在敦煌的地位才真正确立，并改变了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和与其相关的艺术实践活动。北凉军队攻占敦煌后，大肆屠杀本地居民，采取强硬手段统治敦煌，对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迷信鬼神的道教丧葬风俗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兴造佛教石塔和在悬崖峭壁上开窟造像。这一重大转变，显然是北凉统治者把自己狂热信仰的佛教带到敦煌，从而确立了佛教在敦煌的重要地位。敦煌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佛教石塔，这些实物资料，为我们研究北凉时期的敦煌佛教和佛教艺术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参考。^③从北凉佛教石塔的造像题材和供养人题记来看，大多数敦煌北凉石塔的供养人为当地汉人，说明当地汉人在北凉匈奴统治者的影响下，开始加入到信仰佛法、供养营建佛塔的行列。

在北魏平定北凉之前，这里已经是“村坞相属，多有塔寺”了。同时，中原地区流行的禅定也很快传到敦煌。禅定是佛教徒通过集中精神、观想特定对象而获得佛教悟解或功德的一种修习活动。受内地的影响，前凉时期敦煌也出现了修习禅定的高僧，如前面提到的敦煌人单道开就常在自己设计的禅室内坐禅修行；竺昙猷年少时修习苦行，后来修行禅定之法，他常在山头孤峭的岩石上打坐习禅。除了单道开和竺昙

① 关于此处“升平”年号的考证，参看杜斗城等《河西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② 宁强《敦煌石窟寺研究》，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③ 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台北：财团法人觉风佛教文化基金会，2000年。

猷，敦煌地区出生的禅僧还有“专精禅业”的道法，如“常习定闲房”的法颖，“山栖谷饮，禅诵无斂”的慧远，还有接受达摩禅法的慧览等。他们对坐禅的共同兴趣，说明他们的故乡敦煌是禅法流行之地。禅定的流行表明前凉时期敦煌的佛教已和晋代竺法护师徒以译经、讲经为主的佛教有所不同。修习禅定需要安静的环境，因此禅僧经常离开城市，选择人迹罕至的地方，开窟建寺作为修习场所。敦煌莫高窟的开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三、北朝时期敦煌佛教的曲折发展

北朝时期（386—581），敦煌先后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的统治。由于这些政权的统治中心皆在内地，使得敦煌地区的政治地位下降，佛教人物的目光大都投向内地，敦煌佛教变成了“地方性”的佛教。北朝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敦煌籍高僧，据《高僧传》卷十一《释法颖传》记载，释法颖，俗姓索，敦煌人。法颖作为一位律学高僧，在南朝得到宋、齐两代君主的崇信，先后被敕为都邑僧政和僧主，成为替南朝统治者管理佛教的代表人物。南朝齐梁时代的高僧僧祐即为法颖的学生。其他活跃于南朝的敦煌籍僧人还有“专精禅业、亦行神咒，后游成都”的释道法，以及“神悟孤发、履操深沉，到达建康”的释超辨等人。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北朝晚期的写经，主要为《大般涅槃》《法华》《金光明》《胜鬘》《维摩》《无量寿》《药师》《仁王》《方广》等大乘经典，其中以写《大般涅槃》者为最多。这些经后的题记，具体、生动地反映了许多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佛教信仰情况。

北魏灭北凉之后，敦煌佛教一度衰落。446年，太武帝拓跋焘在道教徒崔浩的策划下，开始大规模废佛。他命令各地官吏捣毁塔庙佛像，烧毁佛经，坑杀僧人，北魏境内的塔庙几乎被扫荡一尽，佛教僧团受到沉重的打击。直至452年，太武帝去世，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反其父道而行之，才下令恢复佛法。所以，在北魏统治敦煌的前十年，佛教在